

赵建平 著

社会主义 民主价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的价值逻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建平 著

社会主义 民主价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的价值逻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
价值逻辑/赵建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463 - 5

I. ①社... II. ①赵... III. 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3580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苏莉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逻辑

赵建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347,000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463 - 5/D · 1766

定价 42.00 元

序 言

自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民主”就是一个最为耀眼的词汇。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还是位居底层的普罗大众，都希望用“民主”这一具有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话语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与此同时，不同的时代背景，催生了不同的时代要求，“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手段，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流变。由此，“民主”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变得日益多样、复杂，各种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模式交替演进，而又无法相互取代。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已变得高度发达，无论是普通民众的自觉要求，还是执政者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民主”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当今的民主理论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使得那些后发民主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模式选择上陷入了困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在现代政治大道上走了几百年，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有着话语的强势地位和模式的示范效应。而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仍在民主的荆棘中艰难前行，是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还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开辟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成为关系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的一大课题。

纵观历史，世界各国的民主实践告诉我们，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简单地像一株植物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在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关系非常不同的国家，民主是很难被模仿或者复制的。无论是非洲的强制输入性民主还是印度等国的后殖民时代的民主，都很好地说明了民主政治的生存发展需要配套的社会土壤。反过来，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民主发展道路。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正确的做法是，在本土的社会土壤中去寻找民主的资源，从而使民主从内部生成，发展出真正本土化的根基。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结合国情与世情来加深对民主理论的研究，从而为本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赵建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论》一书正是这一工作的重要成果。

研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建平同志的著作既有一定理论深度又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这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说明了他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而在我看来,其著作的贡献在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作了全面的厘定和梳理。民主模式和理论虽然多样,但都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民主的核心价值,另一个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前者是民主理论的“内核”,因而具有本质规定性;而后者则是民主理论的“外围”,它是服务于内核需要的,因此可以相对多样。“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就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核所在,它规定了我国民主发展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而在具体的民主建设过程中,对政治制度的完善、创新,甚至是对一些制度的引进都是应该以服务“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实现为目的的。可以说,只要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是服务和依存于民主价值的,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是合理而有效的。显然,明确社会主义民主价值是什么,也就有利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第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做了有益的探索。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民主价值”,但作者始终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从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本质属性、基本维度的深入探讨,到最后落实到“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制度与能力实现途径上,正体现了建平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独到看法。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论》一书中,“社会主义民主价值”作为一条红线,很好地将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起来,从而从价值这个角度探讨了中国民主的可行之路。

第三,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具体实现途径的针对性建议。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而民主理论更是如此。只有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才能稳步前行。建平同志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实现途径最终落实到制度建设途径和能力建设途径上不无真知灼见。正如他所提出的,制度建设要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态、理论和制度上来,而能力建设则主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人民公仆的服务能力和人民群众的民主能力。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政治工程。宏观上,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培养公民文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生存土壤;中观上,我们要完善各项制度,提高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发展动

序 言

力；而在微观上，则要求每个公民养成民主意识，而领导干部则要具有服务精神。建平同志在这些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针对性的建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李良栋

2010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李良栋 / 1

第一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基本状况 / 3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历史动因 / 31

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深化路径 / 44

第二章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本质属性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本质的认识历程 / 57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内涵辨析 / 80

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基本特征 / 107

第三章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基本维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 / 11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核心规范 / 155

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社会进步指向 / 172

第四章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实现的制度建设途径

第一节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生态 / 208

第二节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 242

第三节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 256

第五章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实现的能力建设途径

第一节 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291

第二节 推进人民公仆的服务能力建设 / 304

第三节 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能力建设 / 318

参考文献 / 338

后 记 / 356

第一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

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年版,第186—187页)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就是被在此后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反复提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纪念这次会议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用“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①来评价它。其“很不寻常”之处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从这里开始;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这里揭开;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这里开始;第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这里开始;第五,它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新起点的开始。^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① 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参见郭圣福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认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5页。

人民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无论对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这条新道路的开拓,都具有“很不寻常”的意义。这条新道路的开拓,使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成果。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这个实践探索的进程是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进一步深化。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范畴包含着四个基本的层次: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四是贯穿于上述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共建共享”的历史创造精神解放和发展自身作为社会主体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就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确立人民群众权利本位的目标取向,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基础。换言之,就是要唤起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就是要使人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切身利益。”^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与时俱进,以与时俱进引领和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② 程伟礼、戴雪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③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发展的特定概念,“新时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展时期,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开拓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新时期历史进程的“三最”概括,也可以看作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特点、成就、标志的概括。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从新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认识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还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具体到政治发展领域，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重要成果和重要标志之一。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进程。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五四运动开启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进程，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进程，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开启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进程。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一、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研究的渊源

政治民主化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一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人认识民主、追求民主的探索史、斗争史和实践史。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中，许多人对民主的价值层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这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人对于民主的价值思考，始于对 1840 年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的反思。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是天朝大国、世界的中心。鸦片战争中，中国人从英国的坚船利炮中领略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大，也初步感觉到那是一种与中华古老文明迥然有别的文明。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 页。

会。这个历史发展特点决定了中国人对民主的探索和追求是以“求富求强”为目的的,富强与民主的关系,或者明确地说,是民主对于富强的作用和意义,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人民民主价值思考的主题。

如何应对鸦片战争对于古老的天朝大国所带来的冲击和考验? 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共同思考的重大现实课题。魏源(1794—1857)将林则徐(1785—1850)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辟了为抵抗外侮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这是当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认识水平。“师夷长技”的过程,也就是了解和研究夷情夷事的过程。随着局势的变动,“师夷长技”的内容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由“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到“工商立国”,到“君民共主”、“君民不隔”之政治制度,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来说,有意义的事情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的驱使下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近代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认识到借鉴这个制度对于清政府内政改革的意义。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民主运动兴起的30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精英层逐渐形成了“民主”政治观念。但是,总的看来,由于受开放程度不够和文化传统观念的束缚,其间,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一直处于很低的很不具体的水平。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简单的甚至传奇式的介绍,另一方面是他们不断地把西方民主制度与古圣贤之道、三代之法相比照,以三代之法评价西方民主政治,把民主简单地归结为民本,把民权混淆为重民等。在思维方式上,长期处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式束缚之中。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严复(1854—1921)等人的研究和介绍则能够深入到基本价值和基本观念的层次。其中,黄遵宪对西方民主价值的介绍^①,康有为对民主价值的提

① 黄遵宪在出使日、美期间,潜心考察、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一书,并与1890年付刻。黄遵宪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程和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经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黄遵宪比同时代人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的研究和介绍深入到西方民主的基本价值层面,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法治的基本概念和政党、社团的作用。他认为,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西方国家不论何种政体都奉行“以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以平等、人权、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转下页)

倡^①,对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接上页)为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为对“权限”的重视,即“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三)。而中国士大夫重德治而轻法治是不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的。书中有关政党和社团的介绍,体现了黄遵宪对西方民主的真精神的独特理解。他指出:“社会者,合众人之力,众人之希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余观泰西人之行事,贵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无不借众人之力以成事。”日本“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通过“各树其联合力相激而相争”,便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黄遵宪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基于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亲身体验而形成的,比较贴近西方民主的基本精神。虽然其目的并非为了提倡这些观念和价值,而只是为了论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它标志着中国人对民主这一新事物的认识,开始突破制度安排层面而向价值层面迈进,开始把民主制度与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联系起来;标志着中国人对政治关系的认识开始走出三纲五常的范式的藩篱,有了一种新的眼光。

① 甲午海战的惨败,显示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宣告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寻求自强之路的失败,使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无能更是暴露无遗。于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上实践日程。黄遵宪所介绍的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改革模式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精英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以戊戌维新运动为起点,近代中国终于在新的观念基础上开始了对于民主的执著而艰辛的追求。康有为(1858—1927)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自称是“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创言民权者”(《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谢退龄编选:《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这虽然是自许,但也可以看作是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括。如果说黄遵宪是借研究日本政体向中国人介绍了自由、平等、民权等民主价值概念,尚无提倡这些价值观念之意,那么,康有为则是有意而为之了,他在宣传维新变法与“大同”理想的著作中借用这些基本价值概念来思考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探索实现废除君衔、遍行民主、男女平等、人人独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的道路。在他看来,“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他日君衔亦必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耳”(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25页)。大同之世,遍行民主,实行“公政府”。“公政府”奉行自由、平等原则,不再是具有强制压迫性质的国家机器,而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大同之世,第一禁懒惰,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四禁之中,禁独尊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者“长成”,秦始皇再现,使太平大同之世复归于乱世(同上书,第284—285页)。也就是说,大同世界的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基于“人人平等”、“不限人民权利”的原则上的民主社会才可能有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就是遍行民主、男女平等、人人独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同上书,第166页)。这是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康有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无疑存在诸多局限性,但是,他的这些思考是中国人自觉地探索民主价值的起点。这也是其政治思想能够对孙中山、毛泽东等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提出了大同理想却没有解决实现途径,但是,他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正如美国学者纪文勋引用萧功权的话所做的评价:康有为“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为人树立了目标,对历史赋予了意义,因而值得人们敬慕”(〔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转引自萧功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0页)。

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的封建帝制,以孙中山先生(1866—1925)的民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①在民主价值层面,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特别强调人民主权原则和国民的平等自由权利,强调人民主权为政权,政府权力为治权。他指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政治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平等自由的国民参与政权的民主立宪政体。^②平等自由是国民的权利,官吏不过是人民的公仆。为此,必须采取选举、委任与考试、监察相结合的办法,保证“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③。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把中国人关于民主价值的认识水平,推进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价值学说与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高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的思想解放。关于这个时期的民主思潮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各种历史的机缘包括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的进展,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思考、研究和宣传、实践。这是旧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

陈独秀(1879—1942)对民主价值的探求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陈独秀是近代中国鲜明地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的第一人,他的文章和宣传,对于塑造一代青年的民主意识,向民众普及民主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民主价值的探索上,陈独秀始终怀抱民主信念和民主价值理想,但是也出现了几次反复,这在中国近现代民主思想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他在民主价值探索上的曲折,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曲折历程的缩影,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陈独秀一开始就是把民主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来看待的。在发表于《新青年》6卷1号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5日)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

① 参见关海庭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在五卅之前甚至五四期间,陈独秀心目中的德先生就是西方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把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列为“中国人政治的觉悟的第三步”,这种制度与中国的君主专制决然不同,它以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条件,即“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而“伦理的觉悟”即摆脱封建的纲常礼教而树立现代民主价值观念,则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也就是根本的觉悟。^①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陈独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他开始参与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运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民主问题,对民主的阶级实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一篇题为《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随感录”中,他指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从前拿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②这个时期他对于民主的分析疏于简单和偏激,但是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民主理想已经变为苏维埃民主那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了。

到了晚年,陈独秀的民主理想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民主危机、目睹了斯大林时期由于个人专断的影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后,他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在1940年到1942年的通信和政论中,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问题”作了反复的思考,转而对自由立宪民主进行价值重估,从抽象的独立、自由、平等来探索民主的真实价值。他认为斯大林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没有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问题,首要的原因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③。其实“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之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个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④，“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79页。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③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

④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①。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民主。^②无产阶级民主如果没有民主的真实内容,就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基本内容即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同点,也是大众所需要的。斯大林问题表明,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如果没有普遍的民主制作为消毒素,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成为官僚专制和个人独裁。对于苏联问题,不可迷信个人而轻视制度。苏联的经验,尤为后 20 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应该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苏维埃制若无民主内容,仍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俄式苏维埃甚至比资产阶级的形式议会还不如。在《我们的根本意见》中,他还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德意的法西斯制度归为一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制的不完善与法西斯极权专制主义混为一谈。陈独秀提出这些见解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并取得影响之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汹涌澎湃。不知陈独秀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他置身于政治进程之外所进行的这些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制度根源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有真实内容的看法,但是,由于他从根本上归依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而且最终也没有掌握一个可以科学地分析民主问题的方法论,他的民主分析的价值视野已经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轨道而变得不合时宜。陈独秀的这个转变使他由倡导“新青年”者而成为被“新青年”抛下的落伍者,其中的经验教训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李大钊(1889—1927)则是比较早的把民主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关于民主政治问题特别是民主价值问题的思考,始于对中华民国民权旁落之教训的思考。其中教训就

①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5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4 页。

② 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5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0 页。

是：“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不患无为之争权之民人，患在为之争权者，转而窃权之人。”发展国民教育，才能使“民力既厚，权自归焉”^①。从世界政治发展史和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他认为，“适宜之政治”，“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②“民彝”政治可以看作是李大钊先生的民主政治思想的雏形，其中包含着 he 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对民主价值逻辑的初步的比较准确的把握。李大钊研究资深专家朱志敏先生认为：“李大钊所说的‘民彝’指的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习性、本能、智慧、品德及其持守的心理、愿望、意志、价值观念，以及具备这些品性、思想、能力的人民自身。”^③“李大钊的‘民彝’政治理想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精神的理解和追求，只不过特别强调了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但他不是简单地复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持民主主义观念的思想家的理论或概念，而是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某种依据。”^④他指出，个性解放是近代文明的特质^⑤，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價值所在。“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申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于是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⑥“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⑦“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⑧他认为苏维埃俄国所创造

① 《李大钊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600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③ 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④ 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27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

⑦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⑧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77页。在李大钊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精神层面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